

# 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机制研究的贵州实践

宇恒伟 冯粤

(遵义医科大学, 贵州遵义, 563006)

**摘要:** 在国家倡导的全面发展战略中, 各种要素能否实现粘性融合, 并在机制探索上走出一条新路,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之一。近些年来, 贵州省立足以自身发展实际, 通过“教育奠基、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的协同发展模式,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探索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径, 具体体现在: 2018年-2023年间贵州省实施的黔归人才计划、大数据+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新媒体星火工程等。通过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以及社会调查等方法, 系统梳理大学生群体在返乡创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新媒体传播矩阵在乡村振兴中的融合机制, 研究发现: 教育、科技和人才在“政策牵引-平台支撑-要素融合-价值共创”的四维框架下形成协同效应, 构建了“教育培养-技术创新-人才反哺”的良性循环体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时代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范式, 成果之取得主要与机制的形成紧密相关, 并且呈典型的正相关。

**关键词:** 协同 人工智能 新媒体 贵州实践

**中图分类号:** C93/94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实现各项战略任务的进程中, 人才是毋庸置疑的关键要素。其中, 大学生群体在青年一代中更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能否实现“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人才能否与其他因素融合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 贵州省通过各种举措, 以制度创新带动社会全方位的创新。在大数据、生态农业、旅游等层面保持了高速发展, 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 农村电商交易额突破200亿元, 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数年均增长32%。这种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在于, 贵州省构建了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发展机制。本研究旨在揭示三者乡村振兴中的协同作用机理, 为同类地区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模型。

## 一、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理论探索

教育、科技、人才之于国家发展、民族兴盛之作用显而易见, 而以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高度概括, 高屋建瓴, 则尚属罕见。虽然古今中外之文献在此之前对教育、科技和人才都有诸多着重强调, 但是从其协同发展看则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协同发展不应仅停留在零星的理论总结上, 而应以更大规模的、极为广泛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作为衡量。

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协同发展, 具有鲜明的管理学意义。管理一词, 本于系统或者组织, 单个物体的运行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协同发展乃是教育、科技和人才各个要素之间碰撞和融合的结果。对此, 国内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例如, 李强结合中国实践提出“教育链-科技链-人才链”融合模型(2016), 认为教育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人才是载体, 科技是转化器。随着数字经济兴起, 协同理论进一步拓展至“数字赋能”维度(陈劲, 2020), 强调数据要素在三者协同中的黏合作用。贵州实践印证了这一趋势, 其“黔归人才计划”通过教育回流、技术反哺和产业嵌入, 构建了“乡村需求-高校供给-技术转化”的闭环。协同发展的理论倡

导虽然并不鲜见，但是与此相关的深厚的实践总结则反映了新时代的风貌。当然，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协同发展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经验，这就需要对此进行及时的理论总结。

虽说在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协同发展中，人才最为关键，但人才不是孤立的要素，它需要与其他要素进行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与人才相关的其他要素的研究也成为热点之一。如，黄季焜（2020）提出“场景适配”，强调技术需与乡村社会资本耦合。全国实践中，浙江“数字乡村大脑”和四川“智慧农业云”提供了技术整合范例。贵州则创新地提出“三级穿透”模式：省级大数据平台统筹资源、县级运营中心匹配场景、村级数字驿站落地应用。毕节市通过 AI 病虫害识别系统，实现猕猴桃产业损失率下降 42%，验证了技术适配性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一些显性因素，如新媒体等备受关注。Castells（2009）的“网络社会”理论指出，新媒体重构了权力关系。国内研究也发现，短视频平台使农民从信息消费者转为生产者（彭兰，2021），形成“参与式治理”新范式。贵州“村 BA”赛事的新媒体传播具有典型意义：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台江县篮球赛累计观看超 50 亿次，不仅提升地方知名度，更激活村民自治热情。这种“文化 IP+新媒体传播”的模式，创造了技术赋能文化治理的贵州经验。

协同发展最大的意义在于，不同系统和要素之间既有区别，又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有联系以及纷杂的连结。在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机制中，既包含顶层设计，也涵盖政府、高校、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还有资源整合强调数据、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跨界流动，以及价值创造所体现的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的共生。总之，教育、科技和人才的积极活泼在塑造着它们自身的同时，也正以内在的逻辑贯穿于三者互动中，而关键则落脚在其内在体制中形成了一定的运行机制。

## 二、教育、科技、人才维度的贵州实践战略

### （一）教育维度：大学生群体与乡村振兴的融合路径

人能否成才的关键在教育，教育的成功与否又与其社会功能有关。进入新时代后，贵州教育也迎来了高速发展。在夯实基础理论学习的同时，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衔接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国家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大学与乡村振兴的融合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实践到实践也向纵深发展。2018 年 4 月 9 日贵州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揭牌，贵州民族大学开设有国家级社会实践一流课程《乡村振兴实践——城乡规划专题综合训练》，贵州师范大学在惠水探索推进“高校科研+龙头企业+小微企业+合作社”发展模式，贵州中医药大学建成校农直销超市，打通校农结合“专班”直销通道，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通过产学研平台，以技术加盟方式引荐企业在帮扶点流转土地 200 余亩，年投入资金 200 万元，建成食用菌种植大棚 600 余个，2023 年贵州省高校乡村振兴研究中心落户安顺学院，贵州理工学院坚持以党建引领强化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学校党委成立了乡村振兴工作专班……这一连串的数字所体现的是贵州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不断提升。当然，大学的社会功能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知识的外溢和传播，更在于社会为之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发展空间，两者的融合本身就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一。

教育和科技、人才的融合最鲜明地体现在创业层面。早在 2016 年，贵州省就发布了《科技企业孵化器遴选和管理办法（试行）》，在创业平台、链条建设等层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省级众创空间数量从 2018 年的 23 个增长到 2022 年的 67 个。创业是知识社会化的最好见证，它多通过大学生群体迎接新时代的积极性展开，正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发挥自身实力，见证乡村振兴的阵地之一。在遵义市播州区，有一个“硕士村长”计划。47 名农业硕士领衔组建合作社，引入区块链溯源技术打造黄金茶等地理标志产品，带动户均增收 1.2 万元。贵州大学“博士村长”计划于 2017 年 11 月启动，通过技术传播，产业团队走入乡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成为一个个示范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融合绝非简单地停留在点上，它是团队通过特定的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和尝试的结果。

说到底，教育、人才和科技之所以能够实现融合主要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随

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乡村也逐渐认识到了数字化的力量。在广大乡村，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引领村寨赶超先进，既有单纯应用数字传播的力量进行产品销售的，还有更深入的科技运用。毕节猕猴桃基地部署的AI视觉识别系统，通过2000万张图像训练实现14种病虫害98.3%识别准确率。结合无人机精准施药，亩均用药量减少35%，商品果率提升至82%。基于贵州交通任务重，自然地理条件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状况，黔东南州“村务通”平台实现了98%的行政村覆盖。贵州创新科技特派员管理模式，从组团式选派、组团式服务方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内涵。在贵州开展的“科技特派员之家”中，有一处明亮的公示栏（牌）。公示栏（牌）主要涉及的内容有科技特派员姓名、工作单位、专业领域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科技特派员联系帮扶的产业、乡（镇）、经营主体，试验示范的项目及项目实施规模、成效等服务信息，这就为群众对接联系科技特派员，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提供了诸多便利。数字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的特点，如今数字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贵州克服地理环境相对较差，交通相对不便捷，信息相对闭塞等缺陷带了助力。

在贵州新媒体的传播赋能效应中，近几年来最为成功的案例可能是“村超”现象了。根据榕江县委、县政府数据，截止2025年1月村超至今接待了1600多万游客，旅游收入达到了190多亿；村超火爆之后，榕江县新增了5998家市场主体。作为长期保持热度，并在国内外掀起广泛反响的村超，其实它也经过三十多年足球模式的探索，其机制灵活多样，大致可以说是群众主导、政府助力、新媒体提供契机的融合模式。当村超爆火时，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产业背后，企业合作、美食、特产等都具有了市场驱动性，这源于村超所具有流量带动。说到底，这一切都是灵活创新的结果。

## （二）科技维度：AI驱动乡村数字化

教育与科技的融合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除了在传播层面的积极有为外，科技对于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普遍效应。“大学生-人工智能-新媒体”三维融合机制有效破解了人才短缺、技术断层、信息孤岛等乡村振兴面临的痛点，尤其是在管理赋能层面最富成效。人工智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近些年来伴随着deepseek等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且不论与智能相关的产品、技术、教育、医疗、商贸等往来，在社会管理等层面人工智能对乡村的改变更加迅速和鲜明。乡村管理既有村规民约，也有传统道德，以及法律等层面的维系，其中人工智能优化和破除难以剔除的窠臼效果非常明显。黔东南村务通平台集成三资管理、远程医疗等12项功能，借助NLP技术实现苗语语音交互。数据显示，平台使村级事务办理时长缩短68%，群众满意度达91.4%。在社会传统中，个人护理主要依靠亲朋好友、邻里关系、物业等，这些对孤寡老人的照料实际上受很多条件的限制。在“AI+视控”服务全覆盖的情形下，网格化监控和管理减少了人员管理的情绪化和复杂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担负起社会责任。乡村管理在以往多受到“熟人社会”的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实际上需要各种要素的推进。在社会管理以街道协调的情形下，自我管理也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点。借助“枫桥经验”，将不同人群的共同点达到最大，反馈机制良性运转，人工智能数字化可谓必不可少。

## （三）人才维度：创新技术的最大公约数

人才引进和利用，不是教育、科技和人才的简单组合，而是它们彼此之间基于内在的有规律的协同效应，在不同的人才要素、教育领域和科技空间中共同形成了协同共振。

当农业物联网系统切入田间时，传统农户与智能设备间往往存在着鸿沟。农技员带领团队开发出“方言版操作指南”，将传感器数据转化为农谚式提示，使物联网使用率从32%提升至89%。这种技术转译能力，让智能装备真正成为生产工具而非摆设。这是修文猕猴桃产业园的科技创新。从一个小小的点到实现科技的创新，其实科技正是在一个个微小的从实际中而取得的。

科技向现实的转化，绝非是直接将科技直接嫁接和搬到田间地头那么简单。发挥聪明才智，对产品有切身的感受，能够平等地面向自然，这种进步才可能取得。在黔东南的“智慧

苗寨”中，建筑师王旻带领团队将 BIM 建模、环境监测、非遗数据库等八大系统整合为统一平台。这种集成创新源于团队成员的多元背景：既有懂苗绣的文旅策划师，也有精通数据分析的工程师，还有熟悉村务的返乡大学生。他们共同绘制出传统村落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多种技术的整合当然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一个个模块形成最大合力，是一个共赢的系统工程。科技人员从中找到了融合的乐趣，一切就会顺应教育、科技和人才融合机制的意义。

这些实践都证明，乡村振兴中的技术公约数，本质是人才要素的再组织过程。当技术解读者打破认知壁垒、跨界整合者贯通应用场景、制度创新者重构生产关系时，分散的技术模块就能在乡村沃土中生长出系统化解决方案。这种以人才协同为核心的技术扩散模式，正在重塑贵州乡村的发展基因。

#### （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机制

实现高质量发展，往往与系统各要素的完备有关，新时代贵州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教育、科技和人才融合的协同里效应。仅就高等教育人才与科技的融合而言，目前已经形成了“高校研发-企业转化-政府推广-村民应用”等价值链条。教育系统为科技提供储备人才，人工智能为技术提供传播渠道和应用领域，科技手段又反过来强化教育成效。模式说起来简单，但在实际运用中越来越不局限于一村一寨，而是从更广泛的普遍化席卷贵州。如，贵州师范大学开发的苗语 NLP 系统，通过数字驿站向 145 个民族村寨输出服务，技术采纳率较传统方式提升 3.2 倍。贵州实践表明，三维融合机制通过教育链激活人力资本、技术链重构生产模式、传播链重塑价值网络，为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未来需在要素流动机制、技术适配性、文化数字化等领域深化探索，持续释放融合发展红利。

### 三、教育、科技和人才系统发展的机制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贵州省通过政策牵引、平台支撑、要素融合与价值共创四大机制的协同创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一）政策牵引机制：构建制度创新生态圈

顶层设计，是基于宏观政策基础上在强调系统性的同时，也突出可操作性、具体性、协同性。在这一方面，《贵州省大数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的出台就是一典型的顶层设计。《贵州省大数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是贵州省在“十四五”时期（2021-2025 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旨在通过大数据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乡村治理优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探索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该文件于 2021 年发布，依托贵州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优势，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需求，聚焦解决农村产业薄弱、治理效率低、城乡资源不均衡等问题，提出以数据要素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模式。其中，特色产业培育的基本内容是：结合贵州山地农业、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大数据+旅游”“大数据+非遗”等融合业态，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很明显，依靠山地农业、民族文化产业以及生态旅游等，并力图将其产业化，这都是近些年贵州的特色，此文件指出了大数据、数字转型、精准投入等具体的发展路径，具有很多可操作性，有很大的可复制性。

除此之外，制度创新不断升级。贵州省 2013 年起就举办“人才博览会、省外知名高校人才专项引聘、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三大引才活动，探索并形成了“人才+项目+基金”互动引才新模式，引导和激励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突出“急需紧缺”引进人才，创优人才环境“生态圈”。

#### （二）平台支撑机制：成长空间与平台搭建

体制的运行，需要有机体的协调运转。为人才搭建成平台，提供坚实而广阔的空间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机制的配套。2012 年、2017 年、2020 年省委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等文件，目前已有 78 个乡村振兴数字产业园，“贵人才”综合服务平台注册用户突破 120 万，其中贵安新区大数据科创城集聚华为

云、腾讯云等头部企业，建成全国首个农业大数据交易中心；县域特色园区如湄潭茶业数字园、毕节中药材智慧园等，则聚焦垂直领域数字化转型。2023年统计显示，园区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37%，带动周边农户就业23万人次。“贵人才”综合服务平台集成人才匹配、在线培训、政策兑现等功能，其智能算法实现岗位需求与人才技能的精准对接，使乡村技术人才供需匹配效率提升58%。平台沉淀的120万用户数据构建起动态人才画像库，为政府决策提供实时数据支撑。配套开发的黔农云APP覆盖全省88个县，提供农产品溯源、远程问诊等62项数字化服务。

### （三）要素融合与价值共创机制：激活创新发展原动力

雷山县建成茶产业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可追溯。通过物联网设备监测3.2万亩茶园，结合AI炒茶机器人、区块链防伪等技术，打造雷公山茶区域品牌，产品溢价率提升45%。数字化转型带动全县茶农年均增收1.2万元，相关案例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数字农业最佳实践。

非遗数字化工程运用3D建模、VR复原等技术，对苗族银饰、侗族大歌等136项非遗进行数字建档。台江县建立的“锦绣计划”数字化平台，使苗绣产品通过跨境电商销往28个国家，传统技艺传承人平均年龄从62岁降至39岁，实现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良性互动。

州协同创新机制的建构，本质上是生产关系适应数字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变革。这种以数据为纽带、以融合为特征、以共富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展现出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

## 四、主要成效与现实挑战

### （一）形成“教育培养-实践锻炼-创新创业”的人才成长闭环

通过这些年人才引进、培养的多种方法的探索和落实，结合各地实际，为人才创造发挥最大合力的整体环境，贵州省基本上形成了“教育培养-实践锻炼-创新创业”的人才成长闭环。这个闭环，从教育培养开始。近些年贵州省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突飞猛进，突出强调与社会产业的结合，加快培育一批职教顶尖人才，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院校发展动能和体制保障问题的解决，在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突破领域、人才供给等体制机制等方面创新发展动能。2023年，贵州省政府制定出台“贵州技工”“黔菜师傅”“黔灵家政”“黔旅工匠”工程四个实施方案，推动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提升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更加健全的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实践技能的锻炼、提高教育质量保障，贵州职业教育正在迎来全新的发展契机，为社会提供了符合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

### （二）构建“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商业转化”的创新链条

贵阳贵安积极引导大学生、务工返乡人员、退役军人等到乡村干事创业，汇聚一批高素质的“新农人”；清镇市依托贵州（清镇）职教城为核心，强化地方特色，推行“订单培养、校企共育、企业实践、工学结合”等的办学模式，着力培养产业发展急需高技能人才；毕节市公路局通过完善《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局2021~2030人才引进培养发展规划》，摸清干部职工专业、兴趣爱好、特长专长等情况，科学培育党建、管理、技术等各类人才。

不同于以往职业教育存在脱离实际，基础薄弱等特点，社会高速发展促使其转型时需要教育与企业、社会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如何促进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担负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任务。技术研发是否得到有效支持，在哪些领域得到应用，以及市场前景如何等，这些不同环节的粘性更强了。通过以企业定制招生单为导向到教育更加主动地面向社会求发展，专业设置、考研深造、出国、技术交流等环节都体现出来一个链条。人才培养没有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但更需要以市场需求求发展，职业教育院校在苦练内功的同时，形成了更加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

### （三）打造“内容生产-传播扩散-品牌塑造”的传播生态

贵州省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融合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进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不再停留于个体的分散探索，而是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通过人才培养培育，深入挖潜，为技术和社会需求之间搭建了良好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通过需要促发展，通过发展带动教育和科技的互动。如果把教育、科技和人才比作一种信息传播的话，初步形成了“内容生产-传播扩散-品牌塑造”的融合传播生态。

内容生产，是信息传播的核心，直接决定了信息的效用。围绕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融合，内容生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直接的产品，成为社会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助力。依托“多彩贵州网”等新媒体矩阵，推出《数字黔行》系列纪录片，全网播放量超 2 亿次；通过“村 BA”篮球赛等文旅 IP 植入数字技术，实现“线下活动+云端直播+电商带货”联动，2023 年带动农特产品销售 12.8 亿元；培育出“云上屯堡”“数字苗年”等文化品牌，非遗技艺传承人增收超万元。内容生产主要是技术加成，但又是技术和教育以及人才的高度生成的结果，它可以直接作用于需要并转化为生产力。

传播扩散，是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也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在某种层面上却又成为生产力要素。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信息的作用逐渐凸显，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各种信息层出不穷，信息主体外延上扩大，在更加宽阔的空间上产出了诸多价值。不同于传统商品生产，信息虽然是商品价值要素之一，但是其作用范围和价值提升仍有较大差别。苗绣极具贵州特色，苗族又是贵州第一大少数民族，在苗绣不断推陈出新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信息将不同的企业、村寨、人群联系起来，民族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新的关注点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然，目前这种运行机制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尤其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据统计，黔东南州 36% 的乡村学校尚未接入教育专网，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教学设备使用率不足 30%，基建落差造成数字资源虹吸效应，45% 的 AI 项目运营依赖政府补贴，如某茶叶智能分拣系统在补贴终止后停机率达 73%。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贵州实践表明，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大学生群体应紧抓时代机遇，打造跨界协同的要素配置，形成多方参与的价值网络。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深层矛盾，贵州有望建成具有山地特色的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示范区，为西部地区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范式。

## 参考文献

- [1] 贵州省乡村振兴局.贵州省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R].贵阳:2023.
- [2] 陈晓红等.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21(09).
- [3] 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Z].2022.

**本论文为遵义医科大学 2024 年思政专项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 SZZX2024—11。**

## Guizhou's Practice in Research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Yu Hengwei Feng Yue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Zunyi, Guizhou, 563006)

**Abstract:**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advocated by the state, whether various elements can achieve cohesive integration and blaze a new trail in mechanism exploration is one of the key paths to realiz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Guizhou Province, based on its own development reality, has explored a development path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education as the foundation, technology as the enabler, and tal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This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zhou Talent Plan, the Big Data +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New Media Spark Project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18 to 2023.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social survey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matrix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form a synergistic effect under the four-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policy traction - platform support - element integration - value co-creation", constructing a virtuous cycle system of "education training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talent feedback".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the achiev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echanisms and show a typical positive correlation.

**Keywords:** Collabo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Media, Guizhou Practice